

論文

《三事忠告》研究

王 建

要 旨

元の時代の張養浩は中央の高官を担当したこともあれば、地方の長官を担当したこともある。張養浩は役人を勤める各時期に、それぞれ「牧民忠告」、「風憲忠告」、「廟堂忠告」を書き、系統的に自分の政治観を論述した。後世の人はそれを一冊の本にまとめ、「三事忠告」という総書名を付けた。本論は張養浩の生涯の事跡と他の作品を踏まえ、「三事忠告」を分析した。張養浩は社会に対して強い責任感を持ち、政治に励み、庶民を愛し、はばかり言わず諫め、汚職を根絶し、名誉利益に無頓着である。彼の言行は正直な人間の持つべき社会良知と良き情操を表した。「三事忠告」は実に役人たちが読ま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本だと思う。

キーワード： 三事忠告 為政忠告 張養浩 元代

—

说到元代的张养浩，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他的散曲名作《山坡羊·潼关怀古》。此曲情感沉郁，气势雄浑，表达了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关注，尤其是结尾两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沉痛而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兴衰，生活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最终仍逃不出贫困悲苦的命运轮回，读后不禁让人生出无限的感慨唏嘘。孟子曾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这就是说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思想倾向、

艺术旨趣，是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及人品情操密不可分的。而要了解张养浩的为人，不可不读他的另一部著作《三事忠告》。

张养浩(1269~1329)，字希孟，别号云庄，济南人。据《元史·张养浩传》载，他少年时勤奋好学，读书不辍。后游京师，受知于平章(相当于副丞相)不忽木，辟为礼部令史，从此步入仕途。后授堂邑县尹，在任上除暴安民，颇有善政。仁宗为太子时，拜张养浩为监察御史。他直言敢谏，曾上疏痛陈当时的种种弊政，语言切直，遂为当国者所不容。因而罗织罪名，罢其职。张养浩恐及祸，乃变姓名遁去。英宗即位，张养浩受命参议中书省事，进入决策中枢，曾谏阻英宗欲张灯鳌山的铺张奢侈行为，当时与曹元用、元明善号为三俊^①。后因其父老病，于是张养浩弃官归养，在乡间过了将近十年的隐居生活。其间朝廷曾多次委以吏部尚书等官职，他皆辞而不就。天历二年(1329)，关中旱，饥民相食，朝廷又特别任命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这时他已经是六十岁的老者，却毅然临危受命，“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饥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②。四个月之间，他奋力救灾，没在家中住过一夜。终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死于任上。谥文忠，封滨国公。张养浩去世后，关中百姓闻之大恸，“哀之如失父母”^③。综观其一生，可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张养浩不仅是体力行的实干家，而且非常善于总结自己为政理民的经验，随时把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以供后来之从政者参阅。他在堂邑县尹任上著有《牧民忠告》，任监察御史时著有《风宪忠告》，入中书时又著有《庙堂忠告》。明朝时，有人将这三种著作合在一起刊行，总名之曰《三事忠告》，亦称为《为政忠告》。

张养浩为人忠正廉直，既担任过地方官，也担任过朝廷要职，有事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为一代名臣。因此他所著的《牧民忠告》等书在元代就受到很高评价。贡师泰说：“《牧民忠告》者，滨国张文忠所著书也。公以道德政事名于天下，其为学则卓乎有所见，而不杂于权术；其操行则确乎有所守，而不夺于势力。凡见诸论议文字之间，施诸动静云为之际，盖无一不本于仁义孝弟之心也……间尝尽得而读之，废书而叹曰：是何忠厚之至哉！”^④ 当时有的地方官员赴任时还将此书带在身边，以便随时观览，作为施政的参考^⑤。

二

《牧民忠告》二卷，分十纲，其纲目为：拜命、上任、听讼、御下、宣化、慎狱、救荒、事长、受代、闲居。仅从这些名目也可以看出，此书内容包括了一个官员从任命到赴任、行政，再到卸任退官的各个环节。而各纲之下又开列若干子目，如“闲居”纲下有轻去就、致政、进退皆有为、以义处命、求进于己、风节六条子目，对“闲居”一事再作详尽说明。因而全书对地方官员的施政方略及所应注意的事项可以说是作了全面周到的阐述，细致具体，并且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张养浩著此书时，虽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但书中无处不显示着他忧国忧民、勤于政事、殚精竭虑的精神，读之令人肃然起敬。他认为官员在受任之初即应打

《三事忠告》研究

心自省，如何才能报国利民，不辱使命，他特别告诫官员要廉洁奉公，戒绝贪贿：

普天率土，生人无穷也。然受国宠灵，而为民司牧者能几何人？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不自爱也，宁不为世所诮耶！况一身之微，所享能几？厥心溪壑，适以自贼，一或罪及。上孤国恩，中貽亲辱，下使乡邻朋友蒙诟包羞。虽任累千金，不足以偿一夕縲绁之苦。与其戚于已败，曷若严于未然？嗟尔有官，所宜深戒！（《拜命·戒贪》）

这番话既从正面讲到了作为朝廷命官的责任操守，也从反面讲到了贪欲所带来的苦果，非常诚恳真挚。古代有不少官员不愿到边远艰苦的地方去任职，认为那些地方有瘴气为害，于人不和。张养浩则指出为害更甚的还不是地之瘴，而是仕之瘴，他说：

昔人有欲之官而恶其地之瘴者，或释之曰：瘴之为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攻金攻木，崇饰车服，此工役之瘴；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帑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无间远迩，民怨神怒，无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上任·瘴说》）

这里将地方官的横征暴敛、制造冤狱、聚敛货财、奢华淫靡等劣政作为仕宦之瘴，指出其为害更甚，同时也显示了作者对当日黑暗政治的愤怒批判。张养浩又认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兴利除弊，乃是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要为民造福，有两件事是应该时时注意的，一是管好自己的家人，二是管好自己的下属，他说：

居官所以不能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中既不给，其势必当取于人。或营利以侵民，或因讼而纳贿，或名假贷，或托姻属。宴饷征逐，通室无禁，以致动相掣肘，威无所施。己虽日昌，民则日瘁；己虽已欢，民则日怨。由是而坐败辱者，盖骈首骊踵也。呜呼！使为妻妾而为之，则妻妾不能我救也；使为子孙而为之，则子孙不能我救也；使为朋友而为之，则朋友不能我救也。妻妾、子孙、朋友皆不能我救也，曷若廉勤乃职，而自为之为愈也哉！盖自为虽阖门恒淡泊，而安荣及子孙；为人虽欢然如可乐，而祸患生几席也。二者之间，非真知深悟者，未易与言。有官君子，其审择焉。（《上任·禁家人侵渔》）

张养浩这段话揭露了官员家属倚仗权势侵夺百姓的种种丑行，或营利肥私、或因讼纳贿。这

些行径小则妨碍公务，“动相掣肘，威无所施”，大则民怨日增，终则劣迹败露，声名狼藉，徒受其辱。而原来横行无忌的妻妾、子孙、朋友都并不能解救自己。张养浩能看到这一点，说明他的头脑是很冷静清醒的。另一方面，为官者必然会有自己的下属，即所谓吏，吏与长官朝夕相见，关系密切，若不对其严加管束，则那些看似本分的小吏也会乘机盗用长官的权势名义，欺上压下，以售其奸，张养浩对此保持着很高的警惕，他说：

吏佐官治事，其人不可缺，而其势最亲。惟其亲，故久而必致无所畏；惟其不可缺，故久而必致为奸，此当今之通病也。欲其有所畏，则莫若自严；欲其不为奸，则莫若详视其案也。所谓自严者，非厉声色也，绝其馈遗而已矣。所谓详视其案者，非吹毛求疵也，理其纲领而已矣。（《御下·御史》）

作为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其首要职责当然是治理百姓。而张养浩则认为要治理好百姓，首先应治吏，这是更为困难而又要紧的，他说：

人徒知治民之难，而不知治吏为尤难，盖吏与官比，诡诈易生。民远于官，不能知理法，误然而犯，宜若可矜。吏则日处法律中，非不知也，小过不惩，必为大患，无所忌惮矣。尝闻治民如治目，拨触之则益昏；治吏如治牙，剔漱之则益利。（《御下·威严》）

他将治民与治吏形象地比喻为治目与治牙，对于眼睛不可经常搓揉，否则就会患上眼病而昏花，而对于牙齿则应时时洗漱，才能常保其坚利。张养浩的这个比喻，不但很形象生动，而且也指出了治吏的重要性。古时常常有官员以劝农为名，敲剥百姓，实为扰民害民。张养浩对此极为反感痛恨，他指出：“农之勤惰，一岁之苦乐系焉。其所当为有不待劝焉者……常见世之劝农者，先期以告，鸠酒食，候郊原，将迎奔走，络绎无宁，盖数日骚然也。至则胥吏童卒，杂然而生威，贿遗征取，下及鸡豚。名为劝之，其实扰之；名为优之，其实劳之。嗟夫！劝农之道无他也，勿夺其时而已矣。繁文末节，当为略之。”（《宣化·劝农》）

张养浩虽然对为官之道多有思考阐释，但他并不是一个留恋官场的人。从前，陶渊明曾把官场看作拘囚身心的“樊笼”，张养浩对此颇有同感。一旦任期结束，退官而归，他体会到的是如释重负的轻松。他说：“古人以休官致政为释重负而脱羈囚，窃尝思之，诚有是理。方其仕也，严出入而慎起居，一颦一笑，亦不敢以轻假人。盖一身而为众师表，少逾规矩，谤议四闻。譬之特行于高屋之上，自顶至踵，在下者无不见之也。一朝代至，完身而去，诘止如释负、脱羈囚而已哉！”（《闲居·致政》）他又说：“夫轩冕，古人以为倘来之物，其有也何所加？其无也何所损？”（《闲居·进退皆有为》）在官时有在官的作为，退官后

《三事忠告》研究

有退官的洒脱，这就是他所说的“进退皆有为”，他的不少散曲作品也表达了退官后的恬淡情怀，如：“中年才过便休官，合共神仙一样看。出门来山水相留恋，倒大来耳根清眼界宽。细寻思这的是真欢。黄金带缠着忧患，紫罗襦裹着祸端，怎如俺藜杖藤冠。”（《双调·水仙子》）在社会上许多人都为了官场名利而拼命奔走钻营趋之若鹜的时候，张养浩却写出了“黄金带缠着忧患，紫罗襦裹着祸端”这样的句子，表明他对宦途的险恶也有着深切的体验。

《风宪忠告》一卷，分十篇，其题目为：自律、示教、询访、按行、审录、荐举、纠弹、奏对、临难、全节。此书是张养浩任监察御史时所作，监察御史的主要职责是纠察百官风纪（即风宪），弹劾其不法行为，是个得罪人的差事。因而其工作不仅有相当的困难，同时对于个人来说还会有一定的危险，张养浩说：“中外之官，莫难于风宪，莫危于风宪。曷谓难？人所趋者不敢趋，人所乐者不敢乐，人所私者不敢私，所谓‘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非难而何？曷谓危？入焉与天子争是非，出焉与大臣辨可否，至于发人之奸，贬人之爵，夺人之官，甚则罪人于死地。一或不察，反以为辜，则终身无所于诉，非危而何？”（《奏对》）可见对于监察御史一职的困难与危险他是看得很清楚的，但是他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本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个人危难置之度外，以一身凛然正气去面对危难，他说：“君子居其官则思尽其职，所谓危且难者，固有所不避焉”（《奏对》）他指出为了国家民众的利益，即便个人遭受刑辱也是值得的：“夫尽己之职，为国为民而得罪，君子不以为辱而以为荣，虽縲继之，荆楚之，斧钺之，庸何愧哉！”（《临难》）而他本人正是这样作的，任监察御史时，他多次上言指陈弊政，有一次上疏长达万余言，批评“赏赐太多”、“刑禁太疏”、“名爵太轻”、“台纲太弱”等政治弊端，因语言激切，遭致当权者忌恨，遂将他调离，去当个翰林待制。作为监察御史，他认为应该比其他官员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所以《风宪忠告》开篇就提出了“自律”问题：

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严于士焉，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盖执法之臣，将以纠奸绳恶，以肃中外，以正纪纲，自律不严，何以服众？（《自律》）

与担任堂邑县尹时相同，张养浩极为重视官员的廉洁守法问题，而对贪赃纳贿的行为深恶痛绝，其《示教》篇谓：

为人臣子，奸污不法，人孰汝容？夫纳贿营私，所得甚少，所丧甚多。与其事败治汝，曷若先事而教之为愈哉！吾之此言，虽曰薄汝，实厚汝也；虽曰毒汝，实恩汝也。

这些话真是语重心长，竭忠吐诚，详说利弊，即便今天读来，也不难感受到他的一番苦口婆

心。

《庙堂忠告》一卷，共十篇，各篇题目为：修身、用贤、重民、远虑、调燮、任怨、分谤、应变、献纳、退休。张养浩著此书时已担任参议中书省事，是丞相的辅佐，参与决策军国大事，位高权重。但他并没有因权位的升高而忘乎所以不可一世起来，而是更加谨慎地告诫自己荣辱相随祸福相依的道理，其《修身》篇谓：

前辈谓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是不知荣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所谓善自修者何？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甚以率百僚，如是则令名随焉，舆论归焉，鬼神福焉，虽欲辞其荣，不可得也。所谓不善自修者何？徇私忘公，贪无纪极，不戒覆车，靡思报国，如是则恶名随焉，众毁归焉，鬼神祸焉，虽欲避其辱，亦不可得也。于戏！身为宰相，何善不可行？何功不可立？顾乃为区区之利蛊惑而妄行，岂不深可惜哉！且自古居相位者，未闻死于冻饿，而死于财、于酒、于色、于逸乐者，无代无之。

古代思想家老子就曾从形而上的角度提出过祸福相倚的思想，张养浩则根据自己的仕途实践总结出荣辱祸福的紧密关系，并作为修身的原则。这不但显示了他的道德情操，亦可看出他深邃的人生智慧。尤其是最后一句所说，历代丞相绝无死于冻饿的，而死于财、酒、色、逸乐者却无代无之，语言朴实无华，但却具有警醒世人的强大力量。国之根本在于民，故而中国古代就有重民思想，对此，张养浩亦有论述：“国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靖，朝廷之所以隆，宗庙社稷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尔也。夫天以亿兆之命托之相，是知相也者为君又民者也，君也者为天为祖宗保民者也。天以是托我，祖宗以是托我，敢不敬与？敢不慎与？苟受其托而不能使之遂生安业，乃从而扰之、虐之、犬彘之、草菅之，则是逆天而违祖宗之命，以自戕其国也而可乎？彼为民者固不敢与校，然于天之心，于祖宗之心，其能无所戚与？”张养浩提出重民爱民的观点，因为这首先关系到国家的昌盛安定，此外也是由于上天与祖宗的重托。所谓为天为祖宗自然是他思想上的局限，但是若把重民爱民看作是每个官员所应尽的天职，那在客观上将有利于百姓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昌盛安定。张养浩隐退以后，仍不顾年高体衰出任陕西行台中丞，也是他爱民思想的很好体现，他在作品中曾描写当时的情形：“亲登华岳悲哀雨，自舍资财拯救民。”“路逢饿殍须亲问，道遇流民必细询。”（《中吕·喜春来》）而他之所以能写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震撼人心的句子，也正是出于对民生的深切关怀。在《调燮》篇中他还提出了民心的问题：

夫天之人若判然，而实相表里。盖政事顺则民心顺，民心顺则天地之气顺，天地之气顺则阴阳从而序矣。若乃怙势立威，挟权纵欲，恶人异己，谗佞是亲，于所言者不

《三事忠告》研究

言，于所救者不救，上下相蒙，惟务从命。如此欲望民心顺，阴阳之气和，难矣。

天人相应也是中国古代已有的思想，张养浩这里则借以表述他的政治理想。“政事顺则民心顺”，就是说政事是应该围绕着民心进行的，政事的目的是为了民心顺，而民心顺又是天地顺阴阳和的基础，于是揭示了民心顺在国家政治事务中的重要性。

三

严格地讲，张养浩的一系列政治观点并没有为中国政治思想史提供什么新的内容，他的自律修身、勤政爱民、杜绝贪污、直言敢谏，淡泊名利等理念都是前人一再论述过的。张养浩的特点在于他并不满足于单纯理论上的阐发，他的政治观主要是来自于实践，并付之于实践。明代张纶说：“张文忠公《三事忠告》，诚有位者之良规。观其在守令则有守令之式，居台宪则有台宪之箴，为宰相则有宰相之谟。醇深明粹，真有德者之言也。考其为人能竭忠徇国，正大光明，无一行不践其言。”^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指出了张养浩政治观的实践色彩：“其言皆切实近理，而不涉于迂阔。盖养浩留心实政，举所阅历者著之，非讲学家务为高论，可坐言而不可起行者也。”

张养浩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言行显示了一个正直的人所应有的社会良知和优良情操，作为一个封建官僚，这无疑是十分可贵的。当然，以今天的观点看，他的思想也有着相当的局限。例如他多次把管理百姓之事称作“牧”，书名里也标明“牧民”字样，这就把百姓放到了与牛羊牲畜同等的位置，而官员则好比是牧羊人。尽管这在古代是一种极常见的说法，但张养浩既然如此说，就表明他的头脑里也存在着官尊民卑的不平等思想。此外，怎样才能保证官员的廉洁，改善政治，张养浩并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只是满足于以传统的道德情操或社会良知来作说教，而缺乏健全法律的思想。虽然他也有“法律为师”的说法，可他所说的法律指的是典章文物，对官僚们的行为并不具备约束力。于是他的说教就显得软弱无力，很难转化为改善政治的普遍实绩。然而不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人都需要有一份社会责任感、情操、良知，因此《为政忠告》在今天仍然没有丧失其意义。

注 释：

①《元史·曹元用传》。

②③《元史·张养浩传》。

④贡师泰《〈牧民忠告〉序》。

⑤林泉生《〈风宪忠告〉序》。

⑥张纶《林泉随笔》，转引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